

論《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 以戰爭與弭兵書寫為例^{*}

李隆獻

提 要

本文以《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為論述焦點，並以“戰爭”與“弭兵”為例，比較《繫年》《春秋》《左傳》《國語》等書的書寫體式與書寫目的之異同，說明《繫年》的價值與侷限。全文計分八節：一、指出《繫年》的五個問題，並說明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二、《繫年》內容述略。三、《繫年》研究述略。四、《繫年》性質述論：以《春秋》《左傳》《國語》為參照。五、《繫年》與《左傳》性質的異同：以戰爭書寫為例。六、《繫年》與《左傳》兩次弭兵書寫的異同。七、論《繫年》的規範化。八、結論。

關鍵詞：《繫年》 《左傳》 《國語》 規範化 戰爭 弭兵

一、前 言

《繫年》“本輯說明”有云：

* 本文初稿曾於“東亞寫本文獻之規範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漢堡，2022年8月17—19日）宣讀，修訂稿惠蒙《人文中國學報》二位不具名審查委員謬賞，並惠賜針砭，得以有所修訂，謹誌謝忱。

(《繫年》)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史書,原簡沒有篇題,因其史事多有紀年,擬題爲《繫年》。《繫年》共二十三章,體例和一些內容近於西晉時汲冢發現的《竹書紀年》,敘述了周初到戰國前期的史事,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¹

編輯說明定名爲《繫年》,學者因之。李學勤先生是第一位概述《繫年》相關問題的學者,除了介紹《繫年》的性質,並認爲《繫年》可與《竹書紀年》《史記》等傳世文獻參校。又認爲《繫年》每章自爲起訖,以楚國文字寫成,體裁編年,且針對各諸侯國各以其君主紀年。全篇多見楚國相關記載,但可能因當時楚國強大,在國際局勢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著墨較多,因而雖以楚文字書寫,但也不宜直接判定作者即爲楚人;即便作者爲楚人,但篇中並不爲楚國掩飾,有頗爲嚴厲的指責之詞,作者的眼光注重國際,並未受侷限。又說《繫年》的記載時代起於周初,直至約莫戰國中期,但關於西周史跡的內容僅在前四章,主要內容仍在周室東遷之後。前四章的重點實在於周王室何以衰落,諸侯國何以代興,意圖提供讀者了解當前時事的歷史背景,起到以史爲鑑的作用。並推測《繫年》的寫成年代,約在楚肅王、楚宣王之世,即戰國中期。²

李文全面述論了《繫年》的相關問題,計有:

一、“體裁編年”:容易被理解爲“編年體”,不過李先生並未明白指陳。此關乎《繫年》之性質,乃《繫年》的最大爭議,本文另立《四》專節述論之。

二、內容:西周至戰國中期,但前四章並非全文重點。

三、作者及其國別:可能是楚人,但不必然是楚人。

四、作時:約在戰國中期,楚肅王(前 381—370 在位)、楚宣王(前 369—340 位)時。

五、著作目的:以史爲鑑。

李說簡明扼要,堪稱通達,學者之研究大抵即以此爲討論基礎。本文亦植

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

2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96—203。

基於此，並參考近十年來學者之相關研究，野人獻曝，提出一得之愚，敬祈海內外賢達不吝賜正，寔所盼禱。

二、《繫年》內容述略

《繫年》共有二十三個短章，以楚國文字寫成，每章自爲起訖，各章之間大抵具歷時性編排，但時序偶有跳躍。全書主要以晉、楚二國君主紀年，但並非每章皆有明確紀年。時代起自西周，終於戰國前期。茲先簡述各章內容，以便討論。

首章記周武王克殷，設籍田禮，厲王暴虐遭流放於彘，共伯和立。十有四年厲王生宣王，共伯和歸宗，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宣王三十九年於千畝敗績於姜氏之戎，周紀年。次章記西周滅亡始末，以及西周東遷與晉、鄭、齊、楚等諸侯始大事，周紀年。第三章記武王克殷至平王東遷、秦國始大事，無紀年，其中述成王“殺三監”事與傳世文獻有異。第四章記周初遷殷遺民而封衛，春秋初年衛受戎狄侵伐而遷都，並及齊桓公救衛事，周紀年。第五章記楚文王滅蔡、滅息，強娶息嬀，生堵敖、成王事，以楚爲敘事重心，唯並無楚紀年。文中載蔡哀侯人物語言兩次、息侯人物語言一次，爲《繫年》少見。第六章記晉驪姬之亂與秦穆公立晉惠公、秦晉韓之戰、重耳流亡及秦穆公立重耳爲文公事，晉紀年。第七章記城濮之戰與踐土之盟，晉紀年。第八章記秦晉崤之戰，並及秦爲制衡晉而與楚爲好，晉紀年。第九章晉紀年，記趙盾立靈公事，有晉大夫與晉襄公夫人之人物語言近五十字，爲《繫年》少見。第十章晉紀年，記秦晉河曲之戰。第十一章楚紀年，記楚穆王、莊王與宋交惡，執華元爲質事。第十二章楚紀年，記楚莊王伐鄭，晉成公率諸侯救鄭事。第十三章記楚莊王圍鄭，荀林父率師救鄭，楚敗晉於邲。本章雖無明顯紀年，但章前殘缺七、八字，推測當爲楚紀年。第十四章晉紀年，記晉齊斷道之會、鞏之戰，文中載晉景公人物語言一次、卻克人物語言兩次，爲《繫年》少見。第十五章楚紀年，記楚莊王滅陳、申公巫臣等人爭夏徵舒妻少皷事，並及巫臣教吳叛楚，又載楚靈、平、昭諸王事，述及吳入郢、昭王歸楚事，歷時甚長，篇幅亦爲《繫年》少見（僅次於二十三章）。第十六章夾用楚、晉

紀年,述楚晉首次弭兵之會,中有“弭天下之甲兵”盟辭,又記晉楚鄢陵之戰,晉厲公雖勝楚,終“見禍以死,亡後”。第十七章晉紀年,記晉齊溴梁之會、晉“欒氏之滅”、齊“崔杼弑莊公”等事。第十八章並用晉、楚紀年,先記二次弭兵事,次及楚康王即世後,楚靈王、晉平公事。³ 第十九章無明顯紀年,唯文末有楚惠王紀年,記楚靈王、楚惠王、晉平公時晉、楚、吳、蔡等諸侯事。第二十章晉紀年,記晉楚吳越爭霸、黃池之會等事。第二十一章楚紀年,記楚簡王(前 431—408)與宋、三晉事。第二十二章楚紀年,記楚聲王(前 407—402 在位)利用三晉正與越聯兵功齊之機發展勢力,及與諸侯功伐事。第二十三章楚紀年,記楚悼(哲)王初期與鄭、晉的大戰,為《繫年》篇幅最長的一章。全書以晉紀年者計八章,以楚紀年者七章,⁴ 兼用晉、楚紀年者二章,晉、楚紀年次數相當,若以“紀年”之多寡衡之,《繫年》對晉、楚二國並無明顯偏重。

總結以上簡述,可見《繫年》各章大致為獨立的敘事單元。其中前四章之重點實在周王室之所以衰落,諸侯之所以代興,蓋意在提供讀者了解春秋戰國的歷史背景。⁵ 末三章記戰國時楚簡、聲二王與中原諸侯事。記春秋時代者共計十六章,謂《繫年》以春秋時代為記述重心,洵不為過。

三、《繫年》研究述略

《繫年》的內容與《左傳》《國語》《史記》所記頗有重出,雖較三書遠為簡略,但可提供參校,乃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所稱之“二重證據”,出土十餘年來廣受重視,研究者不少。不過相關研究大致不出《前言》歸類的五項,其中“內

3 較為特別的是第十八章記楚莊王滅陳、申公巫臣等人爭少鹽事。傳世文獻夏姬(少鹽)為陳大夫夏徵舒之母,《繫年》則載為夏徵舒之妻。其詳可參拙作:《先秦兩漢傳世/出土文獻中的“夏姬形象”》,《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21—157。

4 若採計第十三章為楚紀年,則亦為八章。

5 《國語·周語上》始自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勿征犬戎,穆王不聽而終征之,導致“自是荒服者不至”的結果;接以厲王暴虐、專利,終遭流放、再以宣王不籍千畝,遂敗績於姜氏之戎與宣王“料民”及幽王時三川皆震,西周滅亡,周乃東遷,後乃叙及《春秋》事,與《繫年》呈現的“資鑑”意識相當類似。見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頁1—27。

容”已見本文《一》，“作時”並無太多異見，爭議較多的端在“性質”，本文將於《三》專節述論。本節先論其餘兩項。

（一）作者及其國別

李學勤先生由書寫文字與內容及楚國國勢推斷《繫年》作者可能是楚人，但不必然是楚人。此說最為通達，但學界仍多爭議，陳偉舉三個理由，推論《繫年》的作者為楚人：一、二十二、二十三章記載楚國國君，甚至封君的謚稱甚詳；二、楚國的世次交替通常言“即位”“即世”，但晉國國君只稱“卒”；⁶三、《繫年》論某國事時使用那國紀年，但在二十二章卻在記載晉國事前用楚國紀年，可見有楚國本位。⁷

蔡瑩瑩藉由比較《左傳》與《繫年》的部分楚史記載，認為《繫年》載述時可能採取對楚國較有利的史料，或經作者有意改寫；《繫年》對楚國人物的評價也與《左傳》貶抑楚人的態度大不相同，推斷《繫年》在諸多細節上呈現傾向楚人的立場。⁸

巫雪如由語法特點入手，分析“及/與”、“于/於”、“焉”、“使”等字的用法，分析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用例，認為《繫年》在文本構成的過程中，雖有保留他國材料的用字習慣，但也有部分融入楚地方言，推斷其編纂過程採取不同時代或不同地域的史料，但作者大抵可以確定為楚人或與楚國關係密切之人。⁹

黃儒宣則異於其他學者，主張《繫年》敘事偏重晉國，且刻意描繪楚軍的兵敗與潰逃，第十八章的紀年方式更有重晉輕楚的傾向，¹⁰所述大多為楚國事，卻在開頭記“晉莊平公立十又二年”，推斷作者非楚人。又認為《繫年》個別文字有三晉特徵，文本形成應與三晉地區有關，並由《左傳》入楚的傳播歷程，找到

6 “即世”/“卒”之體例，《繫年》之規範化尚未完全嚴整，說詳本文第七節之（一）之2。

7 陳偉：《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的文獻學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頁43—48。

8 蔡瑩瑩：《〈清華簡·繫年〉楚國紀年五章的敘事特色管窺》，《成大中文學報》第55期（2016年12月），頁51—94。

9 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清華學報》新49卷第2期（2019年6月），頁187—227。

10 第十八章之紀年確實重晉輕楚，內容卻未必如此，文末更重貶晉國，說詳本文第六節之（三）之2。

了吳起、吳期父子,理由有三:一、《繫年》特在第四章記衛國早期簡史,但戰國時期衛早已衰亡,之所以如此應出於情感因素,而吳起正是衛人。二、第三章專記秦國建立簡史,吳起曾預言西河之地將遭秦掠奪,《繫年》別具眼光地重述秦國的早期發展,事實證明秦在將來益趨強大。三、《繫年》的形成與三晉地區有關,而吳起確曾仕魏,又是《左傳》傳播入楚的重要人物,對於史料的攜帶與認知當有重要關係,所以《繫年》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吳氏父子,只不過推算成書年代約在楚肅王時,吳起已歿,故可能成書於吳期之手。¹¹

段雅麗分《繫年》作者的立場為三:一、楚國立場,“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大多從《繫年》對國君去世稱謂的記載、用楚標記晉國之事、不記齊國史事等角度來看問題”。二、晉國立場,“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大多從晉楚戰爭勝敗描寫的差異來看問題”。三、晉、楚之外的第三方立場。段氏認為,從《繫年》對晉三家的稱謂、《繫年》作者對吳起變法和州西之戰的忽視,以及《繫年》與傳世文獻對鄢陵之戰的不同記載三項分析,《繫年》作者偏向晉國的立場明顯。¹² 黃儒宣與段雅麗之說形成有趣的對比。段說恰足以反駁黃氏吳起父子所作之說。

考察《繫年》內容,除前四章不涉及晉、楚外,其餘十九章對晉、楚互有偏袒,亦互有貶抑,難以個別篇章論定其立場。學者或以為《繫年》作者為業餘史官,或傳、相之流,唯皆難以確論。

(二) 著作目的與立場

李學勤先生已指出《繫年》有“以史為鑑”的著作目的,較早對此回應的是許兆昌、齊丹丹,二氏認為《繫年》作為史書,是有謀篇布局的:第一部分為首章,講述西周王朝的治亂簡史;第二部分則是二至五章,講述西周末幽王立儲之亂,¹³開啓春秋戰國亂世。此四章內容也大致提及後來歷史舞臺常見的大小諸侯國簡史,核心在點出王綱失常,遂有諸侯爭霸。最後六至二十三章則為真

11 黃儒宣:《清華簡〈繫年〉成書背景及相關問題考察》,《史學月刊》2016年第8期,頁21—29。

12 段雅麗:《清華簡〈繫年〉作者立場問題探討》,《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頁50—56。

13 第五章專記楚文王事,與幽王立儲事無涉。

正主體，聚焦於晉、楚爭霸的過程，此二國幾乎佔據春秋歷史的舞台。《繫年》便是一部以“紀事本末”為體例，關注成敗興亡的諸侯霸業史。¹⁴

陳民鎮認為《繫年》並非編年史體，各章以事件為中心敘述，已經可見謀篇之意圖，類似紀事本末。不過也認為《繫年》難以與目前傳世文獻的體式完全對應，既不似編年體一類的《春秋》《竹書紀年》，也未如後世所認知的紀事本末成熟。因此推測《繫年》很有可能是《國語·楚語上》申叔時所言的“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¹⁵其意義正在提供後世歷史成敗的教訓，達到以史為鑑的目的，很有可能便是“志”類文獻，但“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的“志”與“為之聳善而抑惡”的“春秋”並不能說毫無交集，“志”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廣義的春秋，都是為了教導之用。¹⁶

許兆昌認為《繫年》的史觀有三大特點：一是“材料甄別盡棄神話”，二是“歷史敘述皆取人事”，三是“歷史評述不涉天命”。與《左傳》《國語》等史書比較，脫去了宗教式的思惟，象徵朝向人文史觀發展，使得後人對於春秋戰國此一軸心突破時代有不同角度的了解。¹⁷

羅運環則認為《繫年》應是所見第一部“以楚國外交資治為目的”的“紀事本末體雛形”史書。全書寫楚國的章節頗多，主要聚焦在楚國的對外關係，不專門寫內政，即使寫至內政也是為了帶出外交的內容。¹⁸

李守奎從楚人教育方面著眼，認為清華簡內容豐富，涵蓋多方領域，可能墓主身分為師或太師，與楚國王室教育關係密切，且傳世文獻中關於楚國教育的段落亦不少，可見楚國極重視教育，並進一步認為其確與抄撮予楚王閱覽的《鐸氏微》《虞氏春秋》有相同特點，是為了讓王觀歷史成敗，以起警惕之心。且

14 許兆昌、齊丹丹：《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頁60—66。

15 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國語》，卷17，頁528。

16 陳民鎮：《〈繫年〉“故志”說——清華簡〈繫年〉性質及撰作背景芻議》，《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2012年6月），頁49—57、100。

17 許兆昌：《試論清華簡〈繫年〉的人文史觀》，《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頁28—34。

18 羅運環：《清華簡〈繫年〉體裁及相關問題新探》，《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頁193—198。

這些書的成書年代相近,確實不無可能是太師教育楚王室所用的教本。¹⁹

尤銳(Yuri Pines)則由四點思考《繫年》的資料來源:一、《繫年》取材多元,大抵有來自於周、晉、楚等地的史官作品,有《春秋》般的特色,也有敘事體及口傳故事。而《左傳》的史料來源亦豐富,可能共同反映了春秋末戰國初的史官風格。二、《繫年》雖有紀事本末的特色,但並不從《左傳》抄撮,可能有引用共同資料,但《繫年》部分史料與《左傳》不同,也較不重視歷史褒貶。三、雖二書之間存在差異,但對春秋戰國史的認知大抵相符,《繫年》對於當今學者疑古的立場提供有利反駁。四、《繫年》與戰國歷史的相關材料幾乎不同,全不具備“逸事體”風格。不注重歷史的評價而重視事實,使後人對於先秦史學風格的瞭解更趨多元。²⁰

以上學者皆具卓識,但亦有未盡之處,《繫年》確實不是“編年體”,也還稱不上是嚴謹的“紀事本末體”,下節將有較詳細的討論。

四、《繫年》性質述論:以《春秋》 《左傳》《國語》為參照

由於目前出土的竹簡,大部分屬楚系文字,是故近年來學界研究楚國歷史、君王世系、制度等明顯增多。²¹ 關於晉、楚二國在《繫年》的關係,胡凱、陳民鎮、魏慈德等人已有大致的梳理與統整;²² 其他學者也多注意到《繫年》載述春秋史事的紀年方式有晉紀、楚紀雜用的現象,而有不同的推測與討論。

19 李守奎:《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繫年〉性質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291—302。

20 尤銳(Yuri Pines):《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36—254。

21 除各大簡帛網大量針對楚簡進行梳理、分析、釋讀的論文外,尚可參考劉玉堂主編:《世紀楚學》叢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22 胡凱、陳民鎮:《從清華簡〈繫年〉看晉國的邦交——以晉楚、晉秦關係為中心》,《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頁58—66。魏慈德:《〈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頁1—48。

《清華簡》釋文者將其定名為“繫年”，此一名義涉及學者對該書撰寫體式與性質之認識，較早提出《繫年》性質與編纂特點的是許兆昌、齊丹丹。二人提出五項理由，認為《繫年》應看作是“因事成篇”、“紀事本末”的史體：一、《繫年》不具逐年而編、世代相次的文本現象；二、編年體重視事件敘述的時間要素，全文二十三章僅十二次有在敘事之首標出年代，不標年代者多達十次；三、編年體為序年需要，故重視起始之年，但《繫年》標明元年者僅有兩次，其餘十次也只是為敘事需要；四、編年史年代統一，只使用某國年代體系，《繫年》卻混用周、晉、楚三國的紀年；五、編年體必須遵守年代先後順序，《繫年》卻出現不按照時代排列章序的現象。可見《繫年》雖記有年代，但並無編年敘事的意圖，且《繫年》所載史實都圍繞著相關歷史事件展開，各章所述事件集中，主題統一，因事成篇的成分較大，推斷《繫年》主要為紀事本末體。²³

學長朱曉海在《繫年》出土之初即指出其不符編年史書體例者凡六：一、各國世系錯雜，與一般認定的編年史體例不同。二、國君即位世次闕漏，又無季名、月份；三、無特定立場，從未以某國立場稱“我”，不知以何國為本；四、載各種言辭，非記事之體；五、不載天象災異；六、不符/不多史官書法。遂認為《繫年》並非出自史官的編年國史，其性質應屬於春秋政軍梗概的基礎教本，易名為《春秋抄略》或較切當。²⁴

陳偉也提出類似之說：《繫年》出土時因形式類似《紀年》而得名，但卻不似真正編年體。其因有四：一、其不同章節的記述，出現重複的時間點，這在順叙的編年體史書不會發生。二、《繫年》幾乎不曾出現月、日記載，不重視時間的絕對刻度。三、《春秋》《紀年》單純記事而不記言，《繫年》卻言事相兼，可見《繫年》的歷史書寫更為複雜，大抵介於《春秋》《紀年》與《左傳》《國語》之間。四、《繫年》不如《春秋》與《紀年》有明顯本國口吻，可見《繫年》不與《紀年》同類。²⁵

²³ 許兆昌、齊丹丹：《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頁60—66。

²⁴ 朱曉海：《論清華簡所謂〈繫年〉的書籍性質》，《中正漢學研究》第20期（2012年12月），頁13—44。

²⁵ 陳偉：《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的文獻學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頁43—48。

劉全志也否定《繫年》是按年編纂的編年體史書,也不是從《左傳》摘編而來,而類似出土的汲冢國語或《春秋事語》。²⁶

蔡瑩瑩則指出:一、《繫年》少有對話與評論,人物形象描繪亦不鮮明,只講求簡明扼要、因果明確的春秋局勢變化,而不注重道德教化。二、在楚國紀年的五章中不專主中原立場,也能接受楚國的敘事立場,可能暗示讀者對春秋諸侯歷史只要求“大事紀”一般的程度,但可藉此快速獲取知識。三、《繫年》針對的讀者,對歷史知識採“實用”態度,而非欣賞文辭或褒貶人物。四、文體的形式分析固然重要,但無論是何種形式、文體表現嚴謹與否,背後必有其所欲傳達的目的,若能將“內容”與“敘事立場”置於文體之上進行考慮,或可對《繫年》的性質有更深一層的認識。²⁷

楊博則在前人的基礎上作出總結性說明,首先指出《繫年》可大致看作紀事本末體,但仍與當代認知有些許差距,理由有二:一、《繫年》還未有意列出命篇標題,且具體敘事也未真正“詳叙始終”;二、當代所見紀事本末史書都有一原本的“抄撮”對象,《繫年》則未能明確指出其抄撮自何書。不過《繫年》仍有明顯的取材與書寫標準,注重國家發展的重要線索,可視作編纂目的明確、且以紀事本末形式撰寫的史書。其次,《繫年》的史料來源為諸國史記,又可分為“春秋”與“世系”二者,前者的影響來自記事時不免抄入某國紀年,後者則可見記述國君與臣屬的世系大抵清楚完備。所採用的史料,又以晉、楚二國為大宗,鄭、齊、秦、衛、吳為次。再次,《繫年》的編纂目的與特徵,有強烈的“通鑑觀念”、“理性觀念(不記災異與神怪)”與“盛衰觀念”,都指向《繫年》的編纂有強烈的歷史教育功能。若將《繫年》放回戰國時代背景,可以看出此時期的史學突破:敘事跳出時間的絕對限制,產生了紀事本末的書寫模式,也更重視晉、楚二國個別與重要人物。《繫年》也反映了戰國編纂史學的歷史定位,承接了以歷史說人事道理的史學意識,但又不同於“語”類文獻,更注重將事件貫串,以達

²⁶ 劉全志:《論清華簡〈繫年〉的性質》,《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頁43—50。

²⁷ 蔡瑩瑩:《清華簡〈繫年〉楚國紀年五章的敘事特色管窺》,《成大中文學報》第55期(2016年12月),頁51—94。

現實資政的功效。²⁸

羅姝鷗指出《繫年》有三個特色：一、多樣的先秦歷史書寫；二、兼顧敘事的完整與時序的順承；三、額外著墨於歷史轉關之處。並提出“衍生型文本”的概念，即將原始材料與史料整合後所產生的新文本常帶入作者本身的編纂意圖，《繫年》可能便屬此類。且《繫年》文脈時或不協調，或許正呈現了早期文本生成的過程與複雜性，基本上《繫年》仍可作為一獨立且有作者意圖的史籍，豐富了後世對先秦史籍的認識。²⁹

張雨絲、林志鵬由抄撮的角度切入，認為抄撮類史書，其來源不全抄自《左傳》，而應著眼於更廣義範圍的春秋文獻（諸國史事文獻）。且抄撮類史書主要是按照一個或多個主題分章鈔錄與編輯史事，當具有以史為鑑的貴族教材特色。進而由抄撮的角度指出《繫年》的四個特色：一、分章著錄史事，且各章篇幅較短小。二、主題為大國形勢與和戰之事，當是富於戰略性的、為外交資治的歷史教本，其編者亦應為諸如鐸椒、虞卿這樣的傳或相。三、文辭簡省而脈絡通貫，應為成於一人的獨立著作，所抄撮的文本應為分國而具、紀年並不完整的楚地流傳的材料。四、《繫年》的抄撮當與左氏學的傳授系統有極大的關係，可視作《左傳》發展傳流之一。³⁰

劉全志基於《繫年》敘事中有若干錯誤，認為：一、與較為專業的史官書寫相比，《繫年》的書寫顯得業餘、隨意，這些現象正折射出《繫年》的作者應為戰國士人，而非專業史官。二、反駁作者為吳起後人之說：“如果真出於吳起後人之手，《繫年》至少會記載至吳起被楚悼王重任之時，即展現吳起變法的重要性，因為書寫者既然生活在楚肅王或楚宣王時期，那麼他一定經歷或聽聞吳起變法的輝煌，然而《繫年》並非以此結尾，從竹簡的形制來看《繫年》也並非殘篇。所以，將書寫者推斷為吳起後人或吳起弟子是欠周嚴的，至少值得商榷。”三、由《繫年》的價值理念與表述方式觀之，應成書於墨家學者之手，與墨家的

²⁸ 楊博：《裁繁御簡：〈繫年〉所見戰國史書的編纂》，《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頁4—22。

²⁹ 羅姝鷗：《試論清華簡〈繫年〉的書寫背景及其特點》，《荊楚學刊》2019年第6期，頁5—9。

³⁰ 張雨絲、林志鵬：《從清華簡〈繫年〉看楚地出土鈔撮類史書源流》，《中國經學》第2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頁155—174。

知識結構符應。³¹

筆者也運用《繫年》資料，撰寫多篇論文論《繫年》與《左傳》《國語》記事的異同，多兼及《繫年》的性質。³²

上述學者皆睿智的指出《繫年》的某些特殊性質，筆者大致贊同許兆昌、齊丹丹、朱曉海、陳偉、尤銳等人之說，唯朱、陳二先生所提出之判準，乃後世認定的“正統”史書“體例”。誠如朱先生之論析，釋讀者題為“繫年”固不盡當，但種種不合“體例”之處或許正可印證先秦時期各類敘史文獻，未必皆以“正統史書”自居，若然，則固不必皆須步趨“史法”，其不符“體例”或屬自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若各類敘史性質之文獻，未必依循《春秋》《左傳》的“編年記事”體例，則該如何看待《繫年》的性質與著作目的？

讓我們尋根溯源，由傳統史書體例，重新省視《繫年》究屬何種史體及其可能的著作意圖。唐代劉知幾《史通·二體》認為傳統史書可分為二類：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³³

浦起龍以《左傳》為“編年之祖”，《史記》為“紀傳之祖”，確實合乎劉子玄本意。³⁴ 如以“體例”為分類標準，則中國史書大致可分為三體：一、紀傳體，

31 劉全志：《清華簡〈繫年〉的成書與墨家學派性質》，《浙江學刊》2021年第2期，頁200—207。

32 拙作《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為例》（《〈左傳〉與〈繫年〉“戰爭敘事”隅論——以邲之戰、鄢陵之戰為例》，《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297—343、193—241；《先秦兩漢傳世/出土文獻中的“夏姬形象”》《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夏姬敘事”與國際局勢》《“晉悼復霸”說芻論》，《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頁121—157、159—180、181—241；《再論首次弭兵：由宋國地位與華元形象談起》，《臺大中文學報》第73期（2021年6月），頁1—54。

33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27。

34 同上。

二、編年體，三、紀事本末體。紀傳體與本文無涉，姑置不論。

“繫年”之名稱與性質，實關涉傳統史書的“編年記事”之體，與《春秋》更息息相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開篇即云：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³⁵

“編年體”以“時間”爲主，將歷史事件按年、月次序排列。所謂“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表年以首事”者，正是《春秋》，乃至後世“編年記事體”史書的重要特色。《清華簡》題名爲“繫年”，蓋亦本乎此。劉知幾《史通·二體》論“編年體”的優缺點說：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³⁶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³⁷

文中所說的《春秋》，兼指《左傳》。《春秋》編年紀事，重在記錄各國大事，並以其獨特的“史法”表達對各事件的褒貶，而多未詳細描繪人物、鋪陳情節。《左傳》除大體依循《春秋》，“以史傳經”外，亦在無法繫年月，或其事起源甚早，而在某年事跡始明顯者，或其事仍有後續發展者，採追述或附述後事的方式，插叙在相關事件前後。《國語》則以記言爲主，對事件之敘述較爲簡略，亦不強調

³⁵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頁6—7。

³⁶ 絳縣老人，事見襄三十年《左傳》；杞梁之妻，事見襄二十三年。

³⁷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27—28。

編年次序。若由嚴格的“編年體”標準衡量,《繫年》自然稱不上編年體史書,也與《左傳》《國語》等敘史文獻不完全相同,但仍可供吾人跳脫既有的思惟框架,由更廣闊的視角省視先秦時期敘史文獻的多樣性與特色。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中心,分類排纂,每篇敘述一件史事,其優點為窮源竟委,前後分明,易於通曉。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論此體之優點云:

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³⁸

《尚書》堪稱紀事本末體濫觴,《左傳》雖屬編年體,但已有頗多“紀事本末體”篇章,隱公元年的“鄭伯克段于鄆”、僖公二十三、四年的“晉公子重耳之亡”即其顯例;尤銳所稱的“逸事體”,《左傳》更是隨處可見,不煩縷舉。

《繫年》的敘事常有省略情節——注重事件的後果而省略事件發展的詳細環節——的傾向,此一特點其實與《國語》頗為類似,只不過《國語》以“言辭”為主體,對事件的敘述較為簡略。《繫年》亦多見此種“大事紀”式的型態,茲舉二例說明之,《繫年》首章載: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簡1】“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至於厲王。厲王大虐于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簡2】,乃歸厲王于彘。

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于宗。宣【簡3】王是始棄帝籍弗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簡4】。³⁹

38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1—52。

39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136。釋文者為李守奎,簡文採寬式隸定。

此章重點在“宣王不籍千畝”，但《繫年》先追述周武王克殷並立千畝之制，接著略過成、康、昭、穆、共、懿、孝、夷諸王，直轉而叙厲王流彘、共伯和立，宣王不籍千畝，而後“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的結果。此段敘述“繫年”者僅有二處——“(共伯和)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可知此章之敘述重點在千畝之制與不籍千畝之後果。《國語·周語上》“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章載：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⁴⁰

《國語》所記，若除去虢文公勸諫的長篇言辭，單論對事件之簡略敘述，實與《繫年》差異不大，均屬簡要的“大事紀”型態，而非“編年記事”之體。

《繫年》若不屬“編年記事體”，則其“敘事體式”是否類似後世的“紀事本末體”？若就重視“事件”言，《繫年》“記事”的特徵頗為明顯；然而，“紀事本末體”，既須清楚、詳明呈現事件之原委，也不能忽略其年代順序。“本末”既明，則事件之原委、影響、意義亦明，此方為紀事本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之效益所在。就“時序清晰”與“敘述詳明”二要件言，《繫年》恐皆未達標準。如第七章對堪稱春秋前期最重要的史事“晉楚城濮之戰”的載述：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穀，居轅。

晉文公思齊及宋之【簡 41】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居方城【簡 42】。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簡 43】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簡 44】。⁴¹

《繫年》此章明顯具有濃縮事件的傾向，據《左傳》《史記·晉世家》，“晉文公思

40 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國語》，卷 1，頁 15、22。

4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53。

齊及宋之德”以下，時序已在晉文五年；又如“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諸事，《左傳》先有晉文與謀臣的討論，復載述侵曹、伐衛的詳細情節，篇幅幾近千言；⁴²《繫年》則僅以短短十六字帶過，蓋欲呈現略況而已。文末述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朝王於衡雍、盟諸侯於踐土諸事亦皆如此。《繫年》此段敘述尚略去兩件重大史事：“溫之會”與“天王狩於河陽”。城濮之戰，無論在《春秋》或《左傳》載述中，均屬晉文定霸的關鍵戰役；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更是《春秋》褒貶的重心所在。⁴³此二大事，《繫年》皆隻字未及。吾人若承認對歷史事件之記述，必蘊涵作者的史觀與價值觀，則可以推定《繫年》對“城濮之戰”的認識，僅屬晉、楚間之一大戰耳，並未有進一步的價值論斷，似乎無意完整呈現事件的原委、影響與意義所在，⁴⁴此實與《左傳》大相逕庭。

綜觀目前所見的各種傳本、簡本文獻，《春秋》堪稱現存最正規的編年體史書；《左傳》則在大致遵循《春秋》編年記事的架構下，以富瞻的敘事補充了更多內涵，甚至在解經之餘，也有許多獨到的關懷與詮釋。《國語》以國為別，各卷也大致依年代編排，但各語、各章未必有緊密、連續的“繫年”關係，而以“言辭”為最大重點，至於國君、執政對此等言辭是否聽勸及其所導致的後果與相關事件，則大都較為簡略。《繫年》之編排，在年月日之記錄與事件之敘述兩方面，較傳世文獻簡省約略，而其撰作目的／意圖，可能在概要呈現春秋時期的重大事件與國際關係，在如此編纂標準下，其“敘事體式”既不是“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的“編年記事體”，亦非“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的“紀事本末體”。《繫年》之撰述體式，似欲突顯撰寫／編纂者所認為重要的事件，

42 詳僖廿七、廿八年《左傳》，文長不錄；可參拙作：《晉文公復國定霸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78，1988年），頁252—266。

43 僖廿年《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16，頁269、276—277）關於《左傳》引“仲尼曰”以見其褒貶，可參拙作：《〈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425—503。

44 關於城濮之戰的意義與重大影響，可參拙作：《晉文公復國定霸考》，頁265—266；《中國敘事文學的不遷之祧——淺析〈左傳〉的敘事技巧》，《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508—535。

如國際關係、戰爭、弭兵等主題，故由書寫“性質”言，《繫年》可說是介乎“編年記事”與“紀事本末”二體之間的“大事紀”，呈現了另一種戰國時代的史籍特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有言：

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⁴⁵

文中所稱諸“春秋”，蓋泛指史書或《左氏春秋》，而所謂“上觀尚古，刪拾春秋”“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者，乃史公所見先秦時期——《春秋》《左傳》之外——敘史文獻之特色與體式，此一特色、體式確與《繫年》之敘事特質若合符節。雖《鐸氏微》《虞氏春秋》二書早已佚而不存，無法提供實際之文本對照，但史公既曾參考此類史書，進而撰成各諸侯世家，而透過比較，亦可見《史記》與《繫年》確實相當類似，則吾人或可大膽推測《繫年》可能也屬於先秦時期“摭摭春秋之文”、“刪拾春秋”一類的敘史文獻；至其撰作目的，則亦可能因應“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故採取節略、大事紀之方式，以求簡要呈現春秋時期之重大史事，以利爲政者觀覽、資鑑。

五、《繫年》與《左傳》性質的差異： 以“戰爭”書寫為例

本節擬以《左傳》與《繫年》都載述的邲之戰與鄢陵之戰爲例，比較、說明二

45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年），卷14，頁6—8。

書性質的差異。《繫年》第十三章記“邲之戰”云：

(莊)王圍鄭三月，鄭人爲成。晉中林父率師救鄭，莊王遂北【簡 63】……
(楚)人盟。趙旃不欲成，弗召，席于楚軍之門，楚人【簡 64】被駕以追之，遂敗晉師于河。……【簡 65】⁴⁶

本章《繫年》雖有部分殘損，依然可見其敘事簡略，情節欠詳的一貫特色，而略有貶抑晉國之意。“鄢陵之戰”發生在首次弭兵之次年，第十六章：

景公卒，厲公即位。共王使王【簡 87】子辰聘於晉，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師華孫元行晉、楚之成。

明歲，楚王子罷會晉文【簡 88】子變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曰：“弭天下之甲兵。”

明歲，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簡 89】秦，至于涇。共王亦率師圍鄭，厲公救鄭，敗楚師於鄢。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簡 90】。⁴⁷

長期以來，學者對《左傳》所記春秋諸大戰，往往著重其蘊含的人文教化或道德褒貶，如城濮之戰對晉文霸業，予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的論斷，對其武力並不特別重視，而強調其“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的教化之功。⁴⁸ 然而，對“霸主”的追尋與“尊王攘夷”的期待，或許終究只能反映春秋時期的某一面向。隨著時移事往，春秋中期以後，晉國霸業逐漸難以爲繼。此時，晉與戎狄關係密切，而與秦、楚、齊等強國均發生過大戰，與中原諸國，如鄭、衛、魯，乃至周王室也時生齟齬，所謂“尊王”與“攘夷”，似乎都已不再能貼切形容此一時期的中原國際關係。這不禁令我們思索：春秋中期以後，

46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65。

47 同上，頁 174。

48 詳廿七、廿八年《左傳》，其詳可參拙作：《晉文公復國定霸考》，頁 247—316；《中國敘事文學的不遷之祧——淺析〈左傳〉的敘事技巧》第二節，《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 508—535。

晉國是否尚能視為中原的“核心”——不論就價值觀或實際國力言——而《左傳》透過幾場晉、楚大戰，呈現出“核心”與“邊陲”之定位、拉拒與辯證的複雜關係。《繫年》的出土，無疑提供了另一種一視角的春秋史。

爬梳《左傳》晉、楚邲與鄢陵兩次戰爭的評論，即可見學者對晉的評價並不一致。⁴⁹ 茲先略舉較具代表性的論點，再述論《繫年》《左傳》參稽比較下的戰爭意涵。

邲之戰，大勝的楚莊王獲得《左傳》的正面描繪與肯定。評論者通常敏銳地注意到《左傳》記述此戰時，對楚的敘事與晉不相上下，以此顯現楚莊的正面評價，清儒馬驢（1621—1673）即對楚莊相當肯定：

彼楚莊誠一世之雄也，晉方多難，奚堪與抗耶？楚欲效桓、文之事，故強為仁義之言。其於陳也，既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乎釋陳而得陳矣；其於鄭也，既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於宋也，既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是乎釋宋而得宋矣。

邲戰不競，晉國震驚，清丘弗信，衛人渝盟。莊王至此，豈猶有顧中國者乎？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德為威，諸夏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蹊田之諭，子反在師而受登床之盟。君臣之間，有成謀焉，為操為舍，總以收中國之霸權也。善哉晉人之料楚也，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不驕。”隨武子曰：“民不罷勞，君無怨讟。”夫莊之為莊，晉固已明知之矣；知之而猶與戰，其罪甯止在彘子哉！⁵⁰

文中歷數楚莊對待宋、陳、鄭三國，知其“不可取而不取”的策略，反而“以德為威”，遂能“諸夏盡得”、“收中國之霸權”；相較之下，晉國諸卿徒能料楚，卻無以抗衡，其間差別，判若雲泥。毛奇齡（1623—1716）即深責晉國君臣：

49 其詳可參拙作：《〈左傳〉與〈繫年〉“戰爭敘事”隅論——以邲之戰、鄢陵之戰為例》，《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193—241。

50 馬驢著，徐連城點校：《左傳事緯》（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卷4，《楚莊爭霸》，頁164。

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荀、郤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肆忿虐，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禍，東凌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傷，幾乎滅盡。即晉自號能霸，六卿三帥亦將舉而並喪之邲之一戰，夫然後憤戾稍息。……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禍人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責焉？⁵¹

毛西河雖不全然肯定楚莊，但明確指責晉國君臣庸惡無道，累及宋、鄭、陳，全未善盡霸主之職，邲之敗戰，實理所當然。

針對邲之戰晉國大敗的詮釋，諸家幾乎皆傾向以楚莊之勵精圖治，對照晉之君臣無能。此一詮釋脈絡，不脫“有德者獲勝、無道者失敗”的“義戰”、“文教”邏輯。但由上述論析，可知學者對楚莊能否稱爲“霸主”，似乎尚有討論空間，如馬驢雖稱楚莊“欲效桓、文之事”，但仍認定其出於譎詐，乃“強爲仁義”、“以德爲威”；毛奇齡雖言“楚莊當興霸”，唯亦指責其“無禮”。事實上，晉文在城濮之役，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的戰略，藉此激怒楚國，⁵²與邲之戰楚莊的作爲，實無太大差別。

上述各種評論，或許並非有意，但仍不免呈現對楚的敵意或抗拒，這不禁讓我們反思，難道在“中原核心”的思惟脈絡下，晉國所爲，縱有權謀也可稱爲“文教”；而楚國所爲，只要有其策略即屬譎詐？實際檢視《左傳》之敘事，對晉、楚兩造，原則是持平的，尤其對楚莊之行事，邲之戰並無明褒暗諷的傾向，則馬驢所謂“以德爲威”之說，或不免過度詮釋之嫌。

相較於邲之戰，學者對鄢陵之戰的詮釋則呈現相當有趣的分歧：邲之戰，晉國大敗，學者縱或不能完全盛讚楚莊，但整體而言幾乎一面倒指責晉之無道而肯定楚之圖治；鄢陵之戰則否，此役由首次弭兵破裂而起，晉國雖則戰勝，旋即發生內亂，晉厲遭弑，則“有德者勝”的邏輯不再適用。學者的評價分爲二大

51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卷21，《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冊2，頁1477。

52 其詳可參拙作：《晉文公復國定霸考》，頁252—262。

類型：其一認定此役晉國戰勝仍屬正面，乃中原諸國之幸，霸業復興之徵，可惜晉厲無德，故旋即遭禍，如元儒汪克寬（1304—1372）即云：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顛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凌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⁵³

馬驢亦謂：

晉厲公在位八年，……交剛以敗狄，麻隧以勝秦，鄢陵以破楚，挫諸彊敵，功烈庶乎文、襄矣。未幾，內難忽作，身死無後，是何亡之暴與？曰：成功易，居功難也。且鄢陵之勝，倖勝也。……昔城濮勝而晉霸，邲戰敗而晉衰，此一舉也，遠紹文烈，近洗景恥，是桓、文之業，非厲公所能堪也。⁵⁴

汪、馬二氏皆認為晉厲鄢陵勝楚，乃遠紹晉文霸業、近雪中原之恥的大功績。汪克寬責備晉厲“無取勝之道”，馬驢則以“非厲公所能堪”解釋何以勝戰後即生內亂。此類觀點中，持論最切者莫若顧棟高（1679—1759）：

53 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冊165，頁520。

54 馬驢著，王利器點校：《繹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61，《晉楚鄢陵之戰》，頁1401。

自成十二年華元爲晉、楚之成，未三年而楚即背之。賴明年厲公即赫然發憤，勝之鄢陵，射其君中目，中國之威得以復振，則楚不可信，兵不可去，已有明驗矣。……

議者惑于范文子之言，謂晉厲以勝而致亡，此乃《左氏》以成敗論人，從厲公被弑之後假託文子此言耳。厲公之侈，不緣戰勝。若謂釋楚爲外懼，則頃、定之時，諸侯皆叛矣，其能得逞者有幾？吾見其媮惰苟安以至於盡耳，此皆儒者迂闊之論也。⁵⁵

顧氏堅決反對弭兵，強烈主張以戰爭阻擋楚國、恢復霸業，故對鄢陵之戰極度肯定，甚至謂《左氏》假託范文子之言，責其乃“儒者迂闊之論”。

相反的觀點則認爲鄢陵之戰正代表晉霸之衰落無以復振，如高士奇（1645—1704）即曰：

晉伯至景、厲而愈微矣。……

景公既卒，厲公嗣立。追鍾儀之夙約，合華元之好成。西門之壇未掃，南寇之詛益甚。及至鄢陵幸勝，志盈氣驕，外患寧而內憂作。諸侯離叛，曾莫能訓定。首止、汝上之間，紛紛多故，然後知范文子“釋楚外懼”之言，炳如龜蓍也。厲之侈虐，百不如共。有一范文子而不能用，此伯業所以中微也歟！⁵⁶

高氏認爲鄢陵之戰晉乃“幸勝”，而晉厲“志盈氣驕”，不能聽忠臣諫言，霸業遂中衰而不返。有趣的是，高氏文末依然強調“（晉）厲之侈虐，百不如（楚）共”，雖承認晉霸已衰，對楚共卻也未表認同。

透過上述對各家評論的簡單梳理，可以進而思索幾個問題：何以同一場鄢陵

55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晉楚交兵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卷32，頁2523—2525。

56 高士奇：《晉景楚莊爭霸·厲公鄢陵之戰附·總論》，《左傳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27，頁378—379。

之戰，對某些學者而言是“遠紹文烈”的復霸之象，對另些學者則為霸業極衰之徵？何以晉國邲之敗戰，後世解讀沒有太大爭議，鄢陵戰勝，卻有如此兩極論評？又何以學者對楚國通常採排斥否定態度，而罔顧《左傳》對楚國的正面載述？

上述詮釋、解讀傾向，固然可能帶有學者各自的關懷，但也反映了《左傳》對“戰爭”的敘事觀點，特別是對“戰爭”與“道德”關係的特殊觀點，張端穗《左傳對春秋時期戰爭的看法及其意義》有極為精闢的論述：

《左傳》的敘述大部分著重在戰爭發生的原因（遠因及近因）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左傳》記載了許多時人的對話與預言，這些預言充滿了道德上的色彩。它們共同的特色是行為合乎德、禮的一定獲勝，行為違反德、禮，或唯力、利是尚的一定失敗。……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左傳》把戰爭前雙方道德品質上的對比當作是決定這些戰爭的關鍵了。……歷史的發展真如《左傳》所敘述的那麼有規則麼？事實恐怕未必如此，我們只能說《左傳》的詮釋如此。……

《左傳》作者期望以德福一致的歷史史實來曉諭世人：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團混亂。即令在戰爭頻仍，禮崩樂壞的世紀中，道德因果律固然貫穿整個時代。……但歷史史實也顯示德、福不一定一致，《左傳》彌縫的結果，不免沾染了“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色彩。⁵⁷

張氏所論重點有二：一、整體而言，《左傳》的戰爭敘事，傾向以道德之高下詮解勝負之原因，亦即所謂“道德因果律”、“德（道德）福（戰勝）一致論”。二、此一敘事立場，不免出現“彌縫”、“以成敗論英雄”的疑慮，亦即當“德福不一致”時，《左氏》便面臨敘事與詮釋上的兩難。

就筆者之粗略省察，張氏所謂《左傳》“德福一致”的戰爭，其典範案例多在春秋早期，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等，皆強調晉文之“文教”，而晉惠、秦穆之戰敗，亦皆與其人之德行產生連結。春秋中期以後，“德福

57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出版社，1987年），頁251—252、259。

不一致”的戰爭明顯增多,如晉齊鞏之戰便很難說《左傳》完全認同、肯定戰勝的晉國;邲與鄢陵之戰更是如此,《左傳》給予楚國詳盡的篇幅與深刻的描述,對楚莊、楚共也沒有惡劣的評價;戰爭過程中對晉國的描寫幾乎完全落在六卿而少提及晉侯。此類戰爭敘事,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方面呈現春秋前期以“霸主”個人德業為詮釋主軸的敘事模式已不再適用,敘事者的目光轉向各國的權卿與謀臣,此其一;另也暗示春秋中後期,楚國乃至吳、越等南方“邊陲”勢力逐漸興起、壯大,中原霸主則日趨衰頹,敘事者已漸無法完全以中原的視角詮釋史事,此其二。簡言之,歷代學者對鄢陵之戰的兩極評價,正展現了每一個無形中接受《左傳》“德福一致”模式的讀者,在發現此一敘事傾向遭到歷史現實挑戰時的“讀者反應”;而論者通常對楚國多少心存抗拒,不肯承認其霸主之勢,正是受到上述意識形態的影響。

認知此一背景,再省察《繫年》的戰爭敘事,儘管有過度簡化、內容錯漏之弊,但至少有三個特色,呈現出另一種值得重視的敘事模式:一、簡寫戰爭之前因後果,不涉及特定人物的性格或褒貶,亦不論道德教化之有無,僅著重局勢變化與戰爭成敗;二、部分載述略有以楚國角度敘事的傾向,顯示敘事者可能脫離“中原核心”視角;三、對晉、楚二國,皆以其國君為情節推進之主軸,不同於《左傳》對晉之敘述著重六卿,對楚則主要寫其君主。在這些戰爭敘事特色下,遂無所謂“德福不一致”的矛盾,因為《繫年》顯然不重視道德議題,而戰爭之成敗也僅取決於兩國之政策或國際局勢。四、對事件的詮釋方式不同於《左傳》,如較重視弭兵失敗與戰爭之關聯,忽略宋、陳、鄭等弱勢國家在戰爭中的作用,而晉厲遭禍的原因與戰爭連結而非個人德行。不論讀者是否認同此種敘事模式與價值觀,《繫年》確實展現出另一種看待、解讀春秋中後期歷史的詮釋觀點。

六、《繫年》與《左傳》兩次弭兵的異同

(一) 首次弭兵

《繫年》與《左傳》《國語》皆載錄兩次“弭兵”,筆者已有文章論述三書之異

同，⁵⁸茲不重複繁引《左傳》《國語》原文，而以《繫年》為主，先述論其兩次弭兵的異同，再藉此探討其規範化趨勢。《繫年》第十六章記首次弭兵云：

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鄭，為洹（汜）之師。晉景公會諸侯以救鄭，鄭人止鄆公儀，獻【簡 85】諸景公，景公以歸。一年，景公欲與楚人為好，乃敝⁵⁹鄆公，使歸求成。共王使鄆公聘於【簡 86】晉，且許成。⁶⁰

此即成六、七年《左傳》所載“子重伐鄭”事：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⁶¹

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⁶²

由上比照，楚兩次伐鄭，《繫年》可能合併或籠統敘述，整體而言情節差異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就《繫年》的敘事言，其逕以“令尹子重伐鄭”開端，並未解釋楚為何伐鄭，而將重點落在伐鄭後，晉率諸侯救鄭，因而導致鄆公鍾儀被俘，似乎意在交代鄆公鍾儀之後作為使者歸而求成的原因，並凸顯晉、楚的敵對立場。相對的，《左傳》除明言“鄭從晉故也”外，在鄆公鍾儀被俘、入晉之間，特別插入了“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說明楚伐鄭乃因魯成五年“同盟于蟲牢，鄭服

58 參拙作：《再論首次弭兵：由宋國地位與華元形象談起》，《臺大中文學報》第 73 期（2021 年 6 月），頁 1—54。

59 “敝”，《左傳》相似段落作“使稅之”，杜注：“稅，解也。”見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26，頁 448。另有著述，讀“敝”為“脫”，亦通。見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646—647。

60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74。

61 成六年。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26，頁 442。

62 成七年。同上，頁 443。

(晉)也”。⁶³ 換言之,《繫年》偏重呈現弭兵前晉、楚的敵對關係,以及鄭公鍾儀成爲晉使的由來,對鄭前附於楚、後從於晉的反覆作爲較爲省略。《繫年》繼續載述弭兵的過程與結果:

景公使糴之茂聘於楚,且修成,未還,景公卒,厲公即位。共王使王【簡 87】子辰聘於晉,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師華孫元行晉、楚之成。

明歲,楚王子罷會晉文【簡 88】子變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曰:“弭天下之甲兵。”

明歲,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簡 89】秦,至于涇。共王亦率師圍鄭,厲公救鄭,敗楚師於鄢。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簡 90】。⁶⁴

《繫年》此段敘事與《左傳》最大的不同在“厲公先起兵”,提供了另一種觀點與解釋。《左傳》的敘事立場本略有將弭兵失敗歸咎楚國的傾向,《繫年》則似乎將弭兵失敗歸因於晉“先”渝盟起兵“伐秦”,始引出“共王亦率師圍鄭”的鄢陵之戰;又以“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總結此事,似乎暗示晉厲因渝盟在先,故雖戰勝,而終究“見禍以死”,不得善終。且如前述,《繫年》載弭兵盟辭的內容乃是“弭天下之甲兵”,以此而言,任何戰爭——不論中原或邊陲——都可視爲破壞天下的和平狀態,故而晉伐秦自可詮釋爲渝盟。是故《繫年》雖也敘述了“共王亦率師圍鄭”,但顯然傾向認爲弭兵的破壞乃因晉厲先有伐秦之舉,方有楚共圍鄭之事,兩者對弭兵失敗都有責任,也都遭受一定程度的惡果:在楚,是兵敗鄢陵;在晉,是厲公見弑。

(二) 二次弭兵

《繫年》有關二次弭兵的記載相當簡略,其第十八章對此次會盟,扣除紀錄年份的語句,僅有二十餘字:

63 成五年。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26,頁 440。

6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74。

晉莊平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盟【簡 96】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⁶⁵

相較於《左傳》詳記各種會盟細節、人物往來、言語應對等，《繫年》記事一貫簡略欠詳。不過《繫年》紀錄會盟國之大夫次序為“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與襄廿七年《春秋》所載不同：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楚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⁶⁶

《春秋》之順序為“魯叔孫豹、晉趙武、楚屈建”，《繫年》則為“楚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晉、楚二國大夫次序互易，值得注意。實際進行盟誓儀式時，晉、楚又有“爭先”之舉，《左傳》詳載其爭執過程：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⁶⁷

“爭先”之事，《繫年》未見一詞提及。一般而言，“先”者即為盟主，《左傳》文中的五個“先”字，須隨上下文解讀：“未有先晉者”意為“未有先於晉者”，“若晉常先”則指“若晉常為先盟者”。至於最具爭議的“乃先楚人”，究應解作“晉先於楚”抑“楚先於晉”。筆者以為後說較合實情：一方面呼應叔向“無爭先”的

65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80。

66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38，頁 642。

67 同上，頁 646—647。

勸說，方有“乃先楚人”的承轉之語；再者，下文《左傳》刻意詮釋《春秋》“書先晉”的用意，呈現實際情形可能與《春秋》所記不同，方有解釋之必要。以此觀之，此次盟誓在雙方盟書的次序可能以“楚”為“先”，但中原諸侯不願承認，故《春秋》仍“書先晉”，即上引《春秋》“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的順序。《繫年》之記事，向有楚國立場，此處以“令尹子木”居前，應是紀錄本國臣子參與會盟的文例，合乎《左傳》“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的歷史事實與歷史詮釋。

(三) 兩次弭兵的“規範化”書寫

《繫年》的弭兵敘述有一項極為有趣的特點：即將兩次“弭兵”等量齊觀，採相似的用語與敘事模式，如：

1. 並記晉、楚國君世次：

第十六章載首次弭兵云：

（晉）景公使糴之茂聘於楚，且修成，未還，景公卒，厲公即位。（楚）共王使王【簡 87】子辰聘於晉，又修成。⁶⁸

第十八章載二次弭兵云：

晉莊平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盟【簡 96】于宋。⁶⁹

2. 記會盟者與盟約內容：

第十六章云：

楚王子罷會晉文【簡 88】子變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曰：“弭天下之

68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74。

69 同上，頁 180。

甲兵。”⁷⁰

第十八章云：

令尹子木會趙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盟【簡 96】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⁷¹

3. 記晉、楚“先起兵”、“會諸侯”、“見禍”：

第十六章云：

明歲，（晉）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簡 89】秦，至于涇。共王亦率師圍鄭，厲公救鄭，敗楚師於鄢。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簡 90】。⁷²

第十八章云：

（楚）孺子王即世，靈王即位。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朱方，伐吳【簡 98】，爲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靈王見禍，景平王即位。……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許人亂，許公妣出奔晉，晉人羅城汝陽，居【簡 100】許公妣於容城。晉與吳會爲一，以伐楚，門方城。遂盟諸侯於召陵，伐中山。晉師大疫【簡 101】且飢，食人。楚昭王侵伊、洛以復方城之師。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七歲不解甲【簡 102】。諸侯同盟于鹹泉以反晉，至今齊人以不服于晉，晉公以弱【簡 103】。⁷³

由上述對照，可見《繫年》作者似乎有意識的使用相似的語彙載錄兩次弭兵的

70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74。

71 同上，頁 180。

72 同上，頁 174。

73 同上，頁 180。

過程與結果：並列晉、楚國君的在位情形，表明兩次弭兵皆由晉楚共同協商盟約；敘述與會人員、過程以及盟誓內容的格式皆高度相似，表現出《繫年》認知的兩次弭兵似乎性質相近，重要性亦相同，不似傳世文獻偏重二次弭兵而忽略首次弭兵；⁷⁴也可能呈現《繫年》作者／編者對發動戰爭者的某種批判，這可能是戰國時代士人對時局混亂、戰爭頻繁的反思所呈現的歷史記憶。至於所謂“先起兵”者，推測當是《繫年》作者有意指出造成弭兵之約失效的一方，前一次為晉厲公，後一次為楚靈王，也都同樣使用了“會諸侯”、“厲公見禍”、“靈王見禍”等類似用語，則可說《繫年》所理解的兩次弭兵均失敗，而各有不同的責任歸屬，這應是《繫年》敘事“規範化”的結果。

實際上魯襄廿七年之後，晉並非完全停止發動戰事，只是其攻伐對象不再是楚國，而轉向鮮虞、陸渾等；其他中原同盟，也有魯伐莒、齊伐北燕及徐、宋伐邾諸事，凡此都有損害弭兵盟約的疑慮。⁷⁵ 猶有甚者，吳、楚戰爭頻仍，楚屢次“率諸侯”伐吳，顯屬大型戰爭。若然，或許可說，以“中原中心”或“晉楚對抗”的觀點觀之，魯襄廿七年後，晉楚之間——或者擴大而言，“中原”與“南方”之間——確實長期並無戰事，則所謂“晉楚”之間的弭兵仍屬有效；但若由“吳楚爭霸”或其他“邊陲／小國”的角度言，則“天下”的戰爭並未止息，只是由“晉楚對峙”轉為“吳楚相爭”，更有自大國之抗衡轉為大國掠奪小國的趨勢，是以《繫年》所謂“靈王先起兵”而使弭兵更早遭到破壞的觀點，可說傳達了部分事實，這也再次說明了歷史的書寫、解讀與詮釋，會因撰作者的視角而產生不同的趨向，形成看似迥異的敘述，實則在不同的詮釋立場下，又各自合理的歷史記憶。

74 筆者對歷代學者忽視／漠視首次弭兵有詳細的舉證與論述，可參拙作：《再論首次弭兵：由宋國地位與華元形象談起》，《臺大中文學報》第73期（2021年6月），頁1—54。

75 尤其魯伐莒一事，在昭元年晉、楚尋盟時，遭楚大做文章，導致魯使叔孫豹差點被殺，端賴趙武費盡心力始得逃過一劫。事見昭元年《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41，頁699—700）

七、論《繫年》的規範化

上節之(三)已略論《繫年》兩次弭兵的“規範化”書寫，茲再由四方面論《繫年》的“規範化”現象。

(一) 由某些用詞論《繫年》的規範化

1. “即立”(即位)

《繫年》之“即立”，即《春秋》《左傳》常見之“即位”，此乃編年體史書之常例，其慣例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於十二公雖有四位“不書即位”，《左傳》都提出解釋；⁷⁶《繫年》卻非每位國君都書即位，而且有在元年書即位者，僅第十七章記“晉莊平公即位元年”、第二十二章記“楚聲桓王即位元年”兩次而已，⁷⁷可見《繫年》之“即位”體例尚欠嚴謹，或作者／編者不在意此一體例。

2. 即世/卒

陳偉認為《繫年》凡楚君逝世皆用“即世”，而晉君皆用“卒”。《繫年》於楚君之卒確實皆用“即世”；⁷⁸但晉君則不盡然用“卒”，如第十八章記晉平公之逝亦不稱“卒”而稱“即世”；稱諸侯國君之逝為“卒”者有第四章稱衛戴公“卒”；且不獨楚君之逝稱“即世”，諸侯之君稱“即世”者，計有第二章稱鄭武公、鄭莊公，第四章稱衛文公，第二十章稱闔閭皆曰“即世”而不稱“卒”，可見此一體例之規範亦尚欠嚴整。

3. 先起兵、會諸侯、見禍

《繫年》記述兩次弭兵之渝盟情況，十六章為：

76 計有隱、莊、閔、僖四公，《春秋》皆作“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左傳》釋之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1，頁34）莊公元年《左傳》釋之云：“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8，頁137）閔公元年《左傳》釋之云：“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11，頁187）僖公元年《左傳》釋之云：“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12，頁198）

77 分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177、192。

78 不得好死者用“見禍”，說詳下。

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秦，至于涇。共王亦率師圍鄭，厲公救鄭，敗楚師於鄆。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⁷⁹

第十八章爲：

孺子王即世，靈王即位。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朱方，伐吳，爲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靈王見禍。⁸⁰

明顯可見其相似程度：皆有“先起兵”、“會諸侯以伐”云云。又，《繫年》凡稱“見禍”皆指內亂，國君被殺，有貶意。第十六章叙“厲公亦見禍以死”，第十八章叙“靈王見禍”，皆有貶意，由此可見《繫年》確有部分規範化現象。

4. “弭天下之甲兵”

《左傳》記錄許多“盟會”，大都會詳載盟辭內容，盟辭中亦多載淪盟者將遭致神明降禍等詛咒語。⁸¹ 比較特別的是，《左傳》敘述兩次弭兵雖然各方面都相當詳盡，卻未紀錄具體盟誓內容，《國語》亦然；《繫年》兩次弭兵的盟辭則都是“弭天下之甲兵”，全然相同，一字不差，卻未有一言半語提及淪盟將遭致什麼後果。“弭天下之甲兵”一語，究係真正的弭兵盟辭，抑僅是《繫年》對兩次弭兵大旨的概括綜述，尚待更多的證據與考察，不過《繫年》與傳世文獻在上述細節的差異，仍明白顯示其具有獨特的敘事立場與歷史觀念，亦明顯有“規範化”的傾向。

⁷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174。

⁸⁰ 同上，頁180。

⁸¹ 如僖二十八年《左傳》：“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16，頁274。襄十一年《左傳》：“四月，諸侯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懸，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31，頁545—546。

(二) 由批判弭兵失敗論《繫年》的規範化

整體而言，《繫年》對兩次弭兵皆持肯定立場，而批判破壞弭兵者：第十六章敘述首次弭兵及其失敗時，對“先起兵”的晉厲公，似乎有意連結“破壞弭兵”與“見禍以死，亡後”的關係，隱約傳達批判之意，亦即：晉厲率先起兵，使得戰火又起，鄢陵之役雖大敗楚師，最終卻也遭欒書、荀偃弑殺，乃至無後，暗示背盟者不得善終。此種“先起兵”與“見禍死”的連結，可說即“對外戰爭”與“國內動亂”的因果連結。⁸² 至於二次弭兵謂“靈王先起兵”一事，《繫年》的態度則頗堪玩味。楚靈伐吳與縣陳、蔡諸事，《繫年》亦詳加記述，第十五、十九章亦皆提及，蔡瑩瑩曾指出《繫年》的敘事略有“隱約暗示靈王縣陳蔡之舉不當”而為其隱晦的態度，⁸³可能因楚靈風評本即欠佳，《繫年》立場雖一向偏袒楚國，但也僅能隱晦其辭而不敢公然違背史實，謬加稱揚。考察其敘述孺子王、靈王、平王世次即可見端倪：

孺子王即世，靈王即位。

靈王見禍，景平王即位。晉莊平公即世，昭公、頃公皆【簡 99】早世，簡公即位。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⁸⁴

孺子王實遭靈王弑殺，此處卻未如實記其“見禍”，當是有所隱諱。而本章記“靈王見禍，景平王即位”後，並未繫連任何具體事件，僅羅列晉國國君世次，乍看之下有如流水賬，令人費解，但也可理解為《繫年》其實本來也不必特書“靈王見禍”，之所以如此載述，很可能便是為了呼應“先起兵”而歸結於“見禍”，隱晦批判楚靈。

82 說可參拙作：《再論首次弭兵：由宋國地位與華元形象談起》，《臺大中文學報》第 73 期（2021 年 6 月），頁 1—54。

83 蔡瑩瑩：《〈清華簡·繫年〉楚國紀年五章的敘事特色管窺》，《成大中文學報》第 55 期（2016 年 12 月），頁 79。

8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80。

(三) 由僅有“人物語言”而無“對話”與無“逸事體”論《繫年》的規範化

“對話”乃歷史敘事的基本要素，編年體的《春秋》全書無對話，《竹書紀年》當亦無對話。⁸⁵ 紀傳體的代表作《史記》富有充足而具體的對話，編年體的《左傳》也已具有“紀事本末體”與“逸事體”的特色，文中亦透過“對話”以呈現人物的心理，並推動情節，使敘事多元、情節飽滿靈動、人物形象鮮活。相對的，《繫年》全書未見“對話”，情節貧乏而欠多元、人物面目模糊，全書僅有十二次“人物語言”，分別為：

息媯將歸于息，過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息侯弗順，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蔡，君焉敗之。”……蔡侯知息侯之誘己也，亦告文王曰：“息侯之妻甚美，君必命見之。”……⁸⁶

秦穆公乃內惠公于晉，惠公賂秦公曰：“我後果入，使君涉河，至于梁城。”⁸⁷

秦之戍人使人歸告曰：“我既得鄭之門管也，來襲之。”⁸⁸

晉襄公卒，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強君。”……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焉將寘此子也？”大夫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之。”乃立靈公，焉葬襄公。⁸⁹

晉景公立八年，隨會率師，會諸侯于斷道，公命駒之克先聘于齊，且召高之固曰：“今蕃其會諸侯，子其與臨之。”……駒之克將受齊侯幣，女子笑于房中，駒之克降堂而誓曰：“所不復詢於齊，毋能涉白水！”……明歲，齊頃公朝于晉景公，駒之克走援齊侯之帶，獻之景公，曰：“齊侯之來也，

⁸⁵ 其詳可參林春溥、朱右曾、王國維等：《竹書紀年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一書。

⁸⁶ 《繫年》第五章。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147。

⁸⁷ 《繫年》第六章。同上，頁150。

⁸⁸ 《繫年》第八章。同上，頁155。

⁸⁹ 《繫年》第九章。同上，頁157。

老夫之力也。”⁹⁰

司馬子反與申公爭少鹽，申公曰：“是余受妻也。”取以為妻。⁹¹

由上引諸文，可見《繫年》之“人物語言”未必皆為情節與人物之關鍵，對事件之完整性雖略有幫助，但尚不足以完整呈現人物的性格與敘事主題，與《左傳》、《國語》頗為不同，呈現《繫年》的獨特記事方式：不重視人物的互動，也不太具體刻劃人物，故雖重視人物在歷史的地位，但並不重視人物的道德，也不太褒貶人物。又，《左傳》載錄許多“逸事體”史實，且多有褒貶、借鑑之意涵，“晉獻公滅虞虢”即其顯例；《繫年》則全然未見“逸事體”式的記事，由此亦可見《繫年》在敘事、記言的規範化皆尚欠嚴整。

（四）由可能誤記或有意修改史實論《繫年》的規範化

《繫年》在“昭王即位”之後，提及了一般認為正式代表弭兵結束的“召陵之盟”。不過其敘述與傳世文獻頗為不同：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許人亂，許公妣出奔晉，晉人羅城汝陽，居【簡 100】許公妣於容城。

晉與吳會為一以伐楚，門方城。遂盟諸侯於召陵，伐中山。晉師大疫【簡 101】且飢，食人。楚昭王侵伊、洛以復方城之師。

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七歲不解甲【簡 102】。諸侯同盟于鹹泉以反晉，至今齊人以不服于晉，晉公以弱【簡 103】。⁹²

除了時間細節如許公出奔晉、召集會盟者記載欠清之外，內容上《繫年》有兩個重要的“可能誤記”，值得深究。一為“晉與吳會為一……遂盟諸侯於召陵，伐

⁹⁰ 《繫年》第十四章。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67。

⁹¹ 《繫年》第十五章。同上，頁 170。

⁹² 《繫年》第十八章。同上，頁 167。

中山”云云，與《左傳》所記頗有差異。⁹³ 定四年《左傳》載：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⁹⁴

據《左傳》所述，晉與吳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有共同牽制楚的默契，但根據《春秋》與《左傳》，吳國並未參與召陵之盟，⁹⁵《繫年》稱“晉與吳會爲一”，而後轉入“遂盟諸侯於召陵”，容易令人聯想爲晉、吳聯盟，“遂”有召陵之會，屬表述上的混淆，甚至有誤記之嫌。二爲《繫年》稱召陵會盟的結果是“伐中山”，並敘述晉接連大疫且飢，乃至食人，以致出師不利，中原諸侯叛晉，楚則趁機反擊晉、吳聯盟，“復方城之師”。不論《春秋》或《左傳》，召陵之盟的目的皆在伐楚，此由定四年《春秋經》可知：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⁹⁶

《春秋》明言此盟意在“侵楚”，《左傳》簡潔詮釋“召陵之盟”乃爲了“謀伐楚”：

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⁹⁷

⁹³ 關於《繫年》“召陵之盟”的載述，已有學者敏銳的提出看法，如李守奎：《清華簡〈繫年〉與吳人入郢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24日，第7版；孫飛燕：《清華簡〈繫年〉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50—153，但都難成定論。

⁹⁴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54，頁950。

⁹⁵ 限於篇幅，對召陵會盟的前因後果無法詳述。定四年《春秋》詳記與會諸國，共有周、魯、劉、晉、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文見下引）。連邾、頓、胡、滕等小國均列名其中，若吳國參與，不太可能不紀錄。

⁹⁶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54，頁944。

⁹⁷ 同上，頁945。

《繫年》所謂召陵會盟“伐中山”，當為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事，亦見定四年《左傳》：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⁹⁸

晉伐鮮虞中山國雖叙在“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之後，但由《春秋》《左傳》觀之，此事與召陵之盟並無關係，也不見晉師嚴重傷亡；而晉與鮮虞一向小型戰爭不斷，各有勝負，但並無進一步的侵伐或大型戰事，不可能召集十數諸侯大舉會盟以伐。此事當屬《繫年》的錯誤歷史記憶，或有意修改有以致之。《繫年》有關召陵會盟與“伐中山”的錯誤連結，筆者以為，一方面乃是為了隱去諸侯聯盟伐楚等對楚不利的敘述，而代以楚昭“復方城之師”等看似於楚有利的事件；⁹⁹另一方面則藉由轉移焦點，指出縱然楚靈早已“先起兵”，但晉“伐中山”亦對弭兵有所破壞，並帶出“大疫且飢”等惡果，其後又續述晉之“范氏與中行氏之禍”的內亂，再次建構“破壞弭兵”與“國內有禍”的因果連結。換言之，《繫年》可能為了隱晦對楚不利的敘述——晉召諸侯結盟伐楚，同時又有吳國威脅——只好將焦點轉為晉的軍事行動“破壞弭兵”，形成上述“遂盟諸侯於召陵，伐中山”的不正確因果陳述。凡此都可見《繫年》的弭兵敘事已有相當程度的規範化。

八、結 論

透過上文的述論與省察，可得以下幾點結論：

⁹⁸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54，頁 945—946。

⁹⁹ 同年尚有著名的“柏舉之戰”，吳師攻入楚國都城，昭王倉惶奔隨，幾乎喪命，幸得申包胥如秦乞師，始得轉危為安。見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卷 54，頁 951—953。此乃楚之國恥，《繫年》此章於此未見隻字片語，似亦可推知其隱晦其辭的敘事意向。

首先,由傳統經史學、西方敘事學、後設史學,以及歷史記憶理論等角度言,任何歷史書寫,均有其立場或觀點、企圖與目的,僅在“顯隱”、“多少”有別爾。由此一觀點言,《繫年》必然有其編纂/抄撮的動機與目的,只是《繫年》作者難以確論,正如部分學者已指出《繫年》作者可能是業餘史官,或傳、相之流,這些人雖然也一定有其著作意識與目的,但或因其不諳史法,或不拘史法,而導致《繫年》有體例不夠統一、規範化尚欠嚴謹的現象。也可能因其性質並非嚴格的史書,出自抄撮或編纂,未必有明確的“體例”,其資治目的因此不是十分明確,但仍可見其具有一定的歷史關懷。

其次,就性質/體例言:《春秋》編年紀事,以列國大事——如盟會、戰爭以及自然災害/災異,如日蝕、流星、洪水等——為記錄重點與選擇標準,本身既有史書成法之規範、標準表達對事件之褒貶,又以周觀列國之視角書寫,詳記盟會列國次序,而未詳細描繪人物、鋪陳情節。《左傳》則大抵依《春秋》記載,“以史傳經”,而在無法繫年月,或其事起源甚早,而在某年事跡始明顯者,或其事仍有後續發展者,採用追述法或附述後事的方式,插叙在相關事件前後。《繫年》並非每章皆有明確紀年,也非統一採用某國紀年,且全書沒有“逸事體”篇章,並未完全依循“編年紀事”或“紀事本末”二體記事,而是介於二體之間的“大事紀”體式,但仍可供吾人跳脫既有之思惟框架,由更廣闊之視角省視先秦時期敘史文獻的多樣性與特色。

再次,就規範化言:《繫年》只有記載幾次人物語言,完全沒有“對話”,可見其規範化尚欠嚴謹,但由其兩次“弭兵”的載述觀之,《繫年》似乎有意識的使用相似的語彙載錄兩次弭兵的過程與結果:並列晉、楚國君的在位情形,表明兩次弭兵皆由晉、楚共同協商盟約;敘述與會人員、過程以及盟誓內容的格式皆高度相似,表現出《繫年》認知的兩次弭兵似乎性質相近,重要性亦相同,不似傳世文獻偏重、凸顯二次弭兵,而忽略首次弭兵;至於所謂“先起兵”者,推測當是《繫年》作者有意指出造成弭兵之約失效的一方,前一次為晉厲公,後一次為楚靈王,也都同樣使用了“先起兵”、“會諸侯”、“厲公見禍”、“靈王見禍”等類似用語,可說《繫年》所理解的兩次弭兵均失敗,而各有不同的責任歸屬,又重複使用“即位”、“即世”、“會諸侯”、“見禍”、“弭天下之甲兵”等詞語,以及弭

兵書寫的某些共同特色等，具體可見《繫年》仍有其規範化趨勢。

復次，就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敘事異同言：即使載錄相同事件，《繫年》與《左傳》在體例、內容、立場，乃至可能的撰作目的，都差異頗大。《左傳》鋪敘詳明，重視刻畫人物性格，也善於布局情節，廣泛觀照各國局勢，並以禮、道德為其核心關懷；《繫年》則所敘事件雖與《左傳》多有重合，但其立場或敘事意圖卻迥異《左傳》，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敘事風格偏向簡明陳述因果而不乏小錯誤；二、目光聚焦在晉、楚二大強權而對周邊諸國不甚留意；三、關懷或目的主要乃在透過戰爭，陳述二大霸權之勝敗興衰與勢力消長。就此差異而言，嫻熟《左傳》者，或許覺得《繫年》簡陋無文，甚或重勢輕德；但《繫年》確實展示了一種傳世文獻所少見的敘事體例，此種體例既然出現乃至編列成篇，必有其目的與意圖服務的對象，只是其確切背景與文本語境，今日尚難知悉。可說《繫年》一方面揭示戰國時人對春秋史事的關心，一方面也保留了一種獨特的記事體例，值得吾人以更開放的心態省察其特色與價值。

又次，就“戰爭敘事”之意義言：《左傳》之敘戰，不論敘事技巧、立場態度、道德意涵，都是後世學者理解、詮釋春秋各大戰役的重要根據。但若以《左傳》為唯一詮釋，容易造成忘記“凡歷史書寫，必經詮釋”的法則。《左傳》在撰寫之時，或許也只是當時戰爭的一種詮釋方式而已，雖然後世廣泛接受，且幾乎已成為不可動搖的經典，但並不表示必須排斥不同的詮釋方式。《繫年》的出現，雖對今日所認識的春秋史沒有太多的補充——其載錄大體並未超出《左傳》——但確實可提醒、甚或改變吾人閱讀、思索歷史的心態。《左傳》傾向“德福一致”的“戰爭敘事”邏輯，實際上並無法每次都完美無瑕詮釋真實的歷史，也造成後世評論家、學者的諸多爭議；《繫年》無疑提供了另一種反思、詮釋的可能。《繫年》簡寫戰爭之前因後果，不涉及特定人物的性格或褒貶，僅著重局勢變化與戰爭成敗的觀點，擺落道德因果律的詮釋原則，遂無所謂“德福不一致”的矛盾。

最後，就《繫年》反映的思想言：論者或以為《繫年》不載天象、災異，又有材料揀擇盡棄神話、歷史敘述皆取人事、歷史評述不涉天命等現象，與《左傳》《國語》等史書比較，脫去宗教式的思惟，象徵朝向人文史觀發展。但不載天

象、災異、神話,不涉天命,並不表示即脫去宗教思惟。如《左傳》《國語》多載天象、災異、鬼神,也並不表示其即為迷信,而可能藉著因迷信這些現象而導致災禍以警惕讀者,達到勸善懲惡的教化目的。¹⁰⁰《繫年》不記載天象、災異、鬼神,只能說可能其作者/編者不由這一角度看待歷史,而純由現實立論,不必然能成為其朝向人文史觀發展的印證。

(作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¹⁰⁰ 其詳可參拙作:《由〈左傳〉的“神怪敘事”論其人文精神》,《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385—424。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清經解》，冊2。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
-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年。
- 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 李隆獻：《晉文公復國定霸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78，1988年。
- 李隆獻：《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杜預注，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 林春溥、朱右曾、王國維等：《竹書紀年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
- 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馬驢著，王利器點校：《繹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馬驢著，徐連城點校：《左傳事緯》。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 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出版社，1987年。
-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劉玉堂主編：《世紀楚學》叢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年。
-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合著：《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

二、論文

尤銳(Yuri Pines):《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36—254。

朱曉海:《論清華簡所謂〈繫年〉的書籍性質》,《中正漢學研究》第20期(2012年12月),頁13—44。

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清華學報》新49卷第2期(2019年6月),頁187—227。

李守奎:《清華簡〈繫年〉與吳人入郢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24日,第7版。

李守奎:《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繫年〉性質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頁291—302。

李隆獻:《“晉悼復霸”說芻論》,《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81—241。

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425—503。

李隆獻:《〈左傳〉與〈繫年〉“戰爭敘事”隅論——以邲之戰、鄢陵之戰為例》,《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193—241。

李隆獻:《中國敘事文學的不遷之祧——淺析〈左傳〉的敘事技巧》,《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505—543。

李隆獻:《由〈左傳〉的“神怪敘事”論其人文精神》,《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385—424。

李隆獻:《先秦兩漢傳世/出土文獻中的“夏姬形象”》,《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21—157。

李隆獻:《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為例》,《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243—295。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夏姬敘事”與國際局勢》,《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59—180。

李隆獻:《再論首次弭兵:由宋國地位與華元形象談起》,《臺大中文學報》第73期(2021年6月),頁1—54。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96—203。

段雅麗：《清華簡〈繫年〉作者立場問題探討》，《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頁50—56。

胡凱、陳民鎮：《從清華簡〈繫年〉看晉國的邦交——以晉楚、晉秦關係為中心》，《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頁58—66。

孫飛燕：《清華簡〈繫年〉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張雨絲、林志鵬：《從清華簡〈繫年〉看楚地出土鈔撮類史書源流》，《中國經學》第2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頁155—174。

許兆昌、齊丹丹：《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頁60—66。

許兆昌：《試論清華簡〈繫年〉的人文史觀》，《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頁28—34。

陳民鎮：《〈繫年〉“故志”說——清華簡〈繫年〉性質及撰作背景芻議》，《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頁49—57、100。

陳偉：《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的文獻學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頁43—48。

黃儒宣：《清華簡〈繫年〉成書背景及相關問題考察》，《史學月刊》2016年第8期，頁21—29。

楊博：《裁繁御簡：〈繫年〉所見戰國史書的編纂》，《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頁4—22。

劉全志：《清華簡〈繫年〉的成書與墨家學派性質》，《浙江學刊》2021年第2期，頁200—207。

劉全志：《論清華簡〈繫年〉的性質》，《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頁43—50。

蔡瑩瑩：《清華簡〈繫年〉楚國紀年五章的敘事特色管窺》，《成大中文學報》第55期（2016年12月），頁51—94。

魏慈德：《〈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頁1—47。

羅姝鷗：《試論清華簡〈繫年〉的書寫背景及其特點》，《荊楚學刊》2019年第6期，頁5—9。

羅運環：《清華簡〈繫年〉體裁及相關問題新探》，《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頁193—198。

The Nature of the *Chronology*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The Writing about Battles and Ceasefire Treaties as Examples

Lee Long-Shi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hronology* (*Xinian*)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and utilizing its writing about battles and ceasefire treaties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cording practices and aims of the *Chronology*,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Zuo Tradition*, and *Guoyu*, etc., to evaluate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hronology*. The article is comprised of eight sections, as follows: 1) Introduction; 2) The contents of the *Chronology*; 3)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hronology*; 4) The nature of the *Chronology*,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Zuo Tradition*, and *Guoyu*; 5)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writing about battles between the *Chronology* and *Zuo Tradition*; 6) A comparis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Chronology* and the *Zuo Tradition* record the ceasefires between the states of Jin and Chu, which took place in 579 BCE and 564 BCE; 7) Standardizations in the *Chronology*; and 8) Conclusion.

Keywords: *The Chronology*, *Zuo Tradition*, *Guoyu*, Standardization, Battles, Ceasefire